

明代海禁 与海外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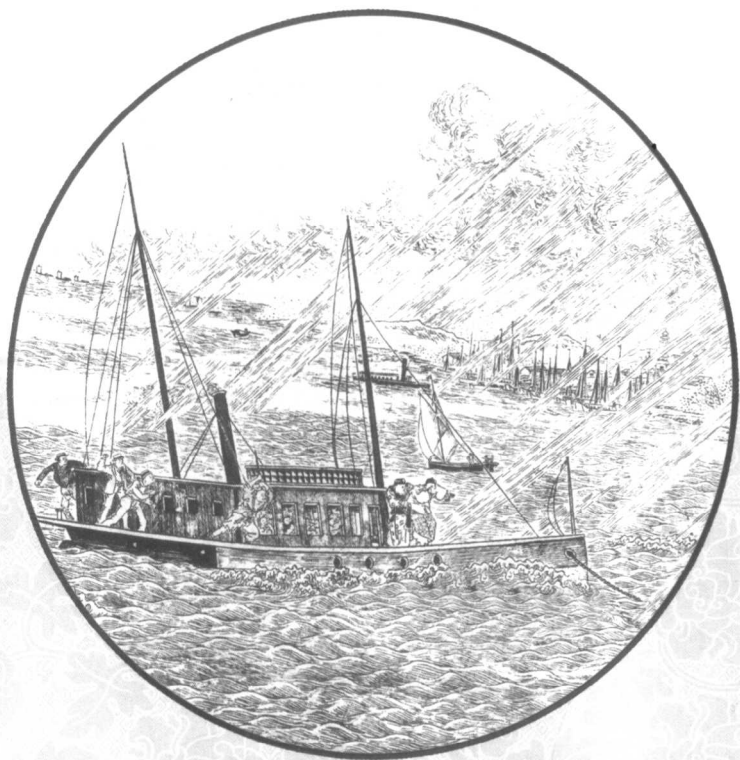
晁中辰◎著



人民出版社

明代海禁 与海外贸易

晁中辰◎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萍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晁中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

ISBN 7-01-004954-8

I. 明… II. 晁… III. 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明代
IV. F7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2832 号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MINGDAI HAIJIN YU HAIWAI MAOYI

晁中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13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4954-8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自 1979 年起,我在山东大学跟着著名的中外关系史专家张维华教授读研究生,学习明清史,以明代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为重点。张先生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虽篇幅不长,只有 8 万多字,但却被学术界视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也引起了 I 我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兴趣。1982 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兼做张先生的助手,为张先生整理出版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 年版)。核对原始文献材料虽费时费力,但却使我接触了大量有关文献,对这个领域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因而也有了更大的兴趣。

1986 年,在宁波举行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明代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3 辑),受到与会代表的重视。传统的观点认为,自然经济是实行海禁的主要原因。我在文中则提出,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自然经济,而是“海疆不靖”,是政治原因,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认可。自此以后,我陆续在这个领域发表了二三十篇论文。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我就想系统地写成一本书。没想到,这成了一项马拉松工程。十几年过去了,只是陆续发了一些论文,书却一直未能完成。一则是教学任务较重,二则是忙

于“奉命写作”。

真是世事难料。2003年下半年我突然病倒，住了一个月的医院。系领导让我静心养病，下半年的课不用上了。因为不下楼，省去了许多社会应酬。于是，我就一边养病，一边整理旧稿，竟然把这本书稿完成了。坏事可以变好事，信矣！

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在明代以前，要么是官方派船出海，要么是经官方许可后，私人船只出海进行贸易，从未有所谓“海禁”一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海禁，既不许私人船只出海，也不派官方船只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亦不许来华，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甚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发展的反动。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私人海外贸易在暗中渐有发展。正德年间始行“抽分制”，使明廷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变。再加上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发生后，嘉靖帝再次申严海禁，使迅速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尤其是正德以后）受到遏制。海商们遂组成大大小小的海商集团，进行走私贸易，对明廷的海禁政策进行激烈的反抗。海商集团中夹杂着少数“倭寇”，于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就被笼统地称之为“嘉靖倭患”。它实质上是一场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

隆庆帝继位后立即在福建漳州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私人出海贸易才真正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于是“倭患”平息，“海宇晏如”。隆庆开放后，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并在明末出现了像郑芝龙那样庞大的海商集团。这期间，白银大量内流，银本位制得以确立，国内商品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

多引人注目的新因素。正因如此,国内外不少学者将明后期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商民大量移居东南亚一带,初步奠定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基础。可以说,明中期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这自然使人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消极地实行海禁(或称之为闭关)政策是没有出路的,积极地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是真正的自强之路。

晁 中 辰

2004 年 1 月 10 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明代以前海外贸易政策的简单回顾	(1)
第一节 汉代以前中外海上交往	(1)
第二节 汉唐时期的海外贸易	(3)
第三节 五代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10)
第二章 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和实行海禁的原因	(16)
第一节 明初封建专制的全面强化	(16)
一、封建专制在政治上的强化	(17)
二、封建专制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化	(20)
三、封建专制在经济上的强化	(25)
第二节 明初对外政策的两重性和实行海禁的 原因	(30)
一、明初对外政策的两重性	(30)
二、明初实行海禁的原因	(32)
三、关于西方殖民者东来说	(40)
第三章 海禁的实施和朝贡贸易	(46)
第一节 明初海禁政策的实施	(46)
一、禁令屡颁	(46)

二、征船户为军和在沿海广置卫所	(48)
第二节 海禁下的朝贡贸易	(50)
一、朝贡贸易的形态和性质	(50)
二、朝贡贸易的衰落和瓦解	(58)
三、朝贡贸易的得失与影响	(63)
第四章 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和郑和下西洋	(78)
第一节 明成祖对外政策的改革和海禁的松弛	(78)
一、重新设立市舶司和创设四夷馆	(79)
二、遣使通好,广加招徕	(80)
三、放宽海禁,优待来使	(83)
四、明成祖对外政策改革的局限	(87)
第二节 恢复对日邦交	(91)
一、遣使通好,恢复邦交	(91)
二、望海碣之战	(95)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	(96)
一、郑和其人 and 下西洋的动机	(97)
二、郑和下西洋的大体经过	(101)
三、盛况空前,成就巨大	(105)
四、国王来访传佳话	(108)
五、郑和航海事业戛然而止的原因	(113)
第五章 永乐后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和私人海外贸易的 暗中发展(洪熙—弘治)	(121)
第一节 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和朝贡贸易的衰落	(121)
一、“下西洋”成千古绝唱	(121)
二、限制贡使,减少赏赐	(124)
第二节 私人海外贸易的暗中发展	(132)

- 一、私人海外贸易得以存在并在暗中有所发展的原因 (132)
- 二、私人海外贸易的特点 (134)

第六章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与正德年间海禁的

- 废弛 (139)
- 第一节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139)
 - 一、16 世纪以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140)
 - 二、葡萄牙人的东来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142)
 - 三、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 (147)
- 第二节 正德年间海禁的废弛 (152)
 - 一、抽分制的实行和海禁的废弛 (152)
 - 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157)

第七章 嘉靖年间的严禁和海商集团的反海禁

- 斗争 (161)
- 第一节 嘉靖初年的争贡之役和申严海禁 (161)
 - 一、争贡之役 (162)
 - 二、嘉靖帝再严海禁 (165)
- 第二节 林富请宽海禁和朱纨严行海禁的悲剧 (169)
 - 一、林富请宽广东海禁 (170)
 - 二、葡萄牙人转贩闽浙 (173)
 - 三、朱纨驱逐葡人和严行海禁 (176)
- 第三节 嘉靖后期海商集团的反海禁斗争 (182)
 - 一、“嘉靖倭患”产生的原因 (182)
 - 二、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 (187)
 - 三、海商集团的反海禁斗争 (196)

第八章 隆庆开放与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201)
第一节 隆庆开放	(201)
一、隆庆开放的原因	(201)
二、隆庆开放的局限	(206)
三、漳州月港的兴盛	(210)
第二节 由市舶司到督饷馆	(214)
一、市舶司职能的演变	(214)
二、市舶司设置的演变	(218)
三、督饷馆的设置和职能	(221)
四、以澳门为基地的贸易活动	(225)
第三节 隆庆开放后海外贸易的发展	(230)
一、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230)
二、与日本的贸易	(234)
三、广州对外贸易的活跃	(239)
第九章 明末海禁的废弛和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兴起(天启—崇祯)	(244)
第一节 明末海禁的废弛	(244)
一、海禁更加废弛	(244)
二、朝贡贸易名存实亡	(247)
第二节 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兴起	(251)
一、海商世家,迅速壮大	(251)
二、归降明廷,首鼠两端	(254)
三、消灭异己,称霸海上	(256)
第十章 明中期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63)
第一节 白银的大量内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263)

一、白银的大量内流	(264)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268)
三、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得以滋生和 成长	(272)
第二节 华侨出国形成高潮	(278)
一、隆庆开放前华侨出国的概况和特点	(278)
二、隆庆开放后华侨激增的原因	(281)
三、隆庆开放后华侨社会的特点	(288)
后记	(293)

第一章 明代以前海外贸易政策的简单回顾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海洋面积占了70%以上,陆地面积还不到30%。但是,由于交通工具和技术的限制,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海上交往晚于陆上交往,它们之间的物品交易最初是通过陆路来进行的。随着人类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海上交往变得日益重要,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和巨大的潜力。从历史上来看,海上贸易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劈波斩浪的航海活动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人类迎来了近代文明的曙光。中国濒海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并且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而与国外的海上交往更是源远流长。

第一节 汉代以前中外海上交往

在汉代以前,由于海外贸易的数量甚少,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海外贸易政策。但是,从有关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外海上交往却导源甚早。据《尚书·禹贡》载:“嵎夷……厥贡盐、菹、海物惟错。”这里所说的“嵎夷”,在《后汉书·东夷传》

中即指东夷。有的学者认为它泛指东方海上各民族,有的学者则认为指的是朝鲜。不论做何解释,“嵎夷”包括某些海外国家和民族当属无疑。它们在夏禹时期即向中原王朝贡纳盐、细葛布和各种各样的海产品。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也不会不有所回赠。这大概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贡贸易”了,而且是通过海路来进行的。

中国船只的出现也导源甚早。据《易经·涣卦》载:“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涣”字的本义即指木在水上。这是说,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就已经用大木作为渡水工具了。在甲骨文中已出现“舟”字,说明商代的造船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据《诗经·商颂》中的《长发》篇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意思是说,商王相土威风凛凛,海外各国也都臣服了。这表明,商代的海外交往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西周时已出现了“关”,但它并不同于现代的海关,因为它是掌管国内贸易的税关,不掌管国际贸易。那时极力招徕外国来贡,并不向它们征税。据《国语·齐语》载:“越裳献雉,倭人贡畅。”可见当时越南和日本都来贡纳。越南来贡是通过陆路还是海路难以确定,但日本来贡肯定是通过海路来进行的。这表明,中国和日本的海上交往已有了相当进步。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像濒海的吴国和越国,都拥有自己的海上船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海外交往自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大都知道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说的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虽是孔子的牢骚话,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不少问题。其一,当时人们对乘船到海外去已不陌生,中国人的海外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其二,孔子并没说要去海外干什么,从他的语气和身

份看来,他大概不准备去经商,而是去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像孔子这样的大儒毕竟极其稀少,大多数人到海外去并不是要传布什么“道”,而是为了经商赚钱。因此,人们从中依稀可以看到,当时已存在着并不罕见的私人出海贸易现象。只是因为这类私人海外贸易的规模很小,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因而也看不到当局对此有什么管理和征税措施。其三,根据普通常识,历史记载一般都落后于历史实际。因此,在春秋战国以前,私人出海贸易活动可能就已经出现。在西周甚至更早的时候,既然日本和东海、南海的一些岛国能来中国贡纳,中国人就更能到海外去。只是因史载阙文,我们一时无法确定私人海外贸易到底始于何时,但有一点大体可以肯定,即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私人出海贸易活动就已出现。至于秦始皇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给他以“巨万计”的钱财到海外求仙药,很像一次大型的官方海外贸易活动,只是徐福去日本久居不回而已。但发生在秦统一后不久的这次大型航海活动告诉人们,当时较大型的海外贸易活动已成为可能。那么,在此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小型的私人海外贸易活动也是可能的。齐景公既然能“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吴国居然能派出一支大型水师从海路攻打齐国,那么人们就不难想见,当时已具备了进行较大型海外贸易活动的能力。

第二节 汉唐时期的海外贸易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盛世之一,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都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对外交往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这时,不仅在西北陆路出现了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繁忙

的“丝绸之路”，而且在东南海上也出现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处近海”的交趾、日南（今越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另外，书中还记述了一条中国商船去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航线：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出发，经都元国（在今马来半岛），再陆续经邑卢没国和谶离国（均在今缅甸沿海），最后抵达黄支国（在今印度）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当时，“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糒，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很明显，这里所记述的是汉代官方所进行的海外贸易。这种贸易主要是为宫廷换取奇珍异宝，因而由宦官（黄门）主持和管理。

以前人们大都知道，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丝绸经阿拉伯人之手大量转运到罗马帝国。实际上，当时中国丝绸也有许多是经过海上贸易而转运到罗马的。中国商人将丝绸等中国物品运到印度南部，一些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再将这些商品经红海运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等地，然后经地中海运至罗马。罗马帝国当时被称作大秦，其商人“与安息，天竺交布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① 这是中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的最早记载，而且是通过海路来进行的。学者们认为，来者很可能不是罗马使臣，而是罗马商人。他们可以直接见到中国皇帝，而且以前素未通中国，可见汉王朝对海外使者或商人都持欢迎态度。

^① 《后汉书》卷八十八《大秦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汉代不仅在内地设“关”，以稽查行旅，向商人征税，而且还 在濒海港口设立了“海关”，并设置“候”官进行管理。据《列女传·珠崖二义》载，某珠崖令死后，“遂奉丧，归至海关。关候、士吏搜索，得球（珍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这是中国历史上设“海关”的最早记录。诚然，汉代的“海关”和现代海关在职能上有极大的差别，它的原意就是设在海边的“关”。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海关”上有“候”官，还有一些“士”和“吏”，其职能是负责稽查。

关于候官的职掌，在唐代李吉甫著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得较为详细。据该书记载，在今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其一，“候官”分左、右二职，左职在前，左职尊于右职，可见这是指汉武帝以后的事，因为汉武帝时才改汉初尚右为尚左。其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可见候官负责管理海关仓库，储备一些商品以便与外国贡使或商人进行交易。其三，“与交易，有利”，可看出候官负责交易事，并从中获利。至于这里的“利”是否包括税收，不得其详，大概是仅指在交易中赚到的“利”。另外，“海关”上的长官称“候官”，“候”有迎候之意，大概主要是指迎候贡使。那么，这里的“交易”主要就是指官方的朝贡贸易了。

在汉代，不仅与南海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日本多次遣贡使来中国，其间自然都有一定数量的物品交易。东汉时，日本还接受了汉王朝颁赐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此金印至今尚存日本。不难想见，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一定有所发展。东汉末，不少汉王室成员为避乱逃到日本，受到良好安置，史称“归化人”。据

有关报道,日本的“原田”氏即为刘邦后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权更替比较频繁,但海外交往和海外贸易还是有所发展,尤其是南方相对较为安定,这类交往和贸易更为频繁。孙吴政权曾派一支万余人的船队横渡台湾海峡,到达“夷州”(今台湾),充分表明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了明显提高。孙吴政权还派朱应和康泰出访南海诸国,对各地物产都做了详细记述。这些地方当时都和中国保持着贸易往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罗马商人秦伦这时来到孙吴政权的首都,还受到孙权的接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与罗马帝国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贸易往来。在两晋南北朝时,这种海外贸易活动也一直没有中断。据《唐六典·互市监》注文载:“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尤其是南梁时期,海外贸易还一时显得颇为活跃。“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职贡,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①据阿拉伯史学家记载,在公元6世纪时,也就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中国船只经常进入波斯湾,并由此进入幼发拉底河,与当地阿拉伯人进行交易,至于中国政府如何管理这类海外贸易,则史无明文。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似乎都不加限制,大都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

隋虽是个短命王朝,但国力一度颇为强盛。隋统一中国后,在海外贸易方面有一些新举措。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朝不仅在沿边设“交市监”,而且在隋炀帝时还“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等四方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从“交市监”和“四方馆”当时的职掌来看,主要是掌管国内各民族

^① 《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